

第八章

「公開性」與大眾傳播



以往，共黨國家的大眾傳播具有下列四個特點：(1)新聞的取捨標準以政治考慮為首要。因此，除了現行黨的政策與經濟發展狀況值得報導宣傳外，其他事件都是沒有價值、微不足道的。(2)大眾傳播肩負教育功能，因此媒體只能用來宣揚馬列意識形態、政黨現行政策，以及共黨所謂的「成就」。(3)共黨全面控制了所有傳播媒體，並透過嚴密的檢查制度，以保證媒體上的報導事物都符合黨的要求。(4)只有共黨、共黨所控制的政府及共黨監督的組織才能擁有傳播媒體，以確保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的純潔性。這也是蘇聯成立七十餘年來，其大眾傳播媒體的寫照。不過近幾年來，這些特質有了鉅大的改變。

一、蘇聯的傳播理論與實際

蘇聯的大眾傳播媒體是用來加強統一社會的意識形態、道德及政治，以便能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及宣傳進行鬥爭，並且要對蘇聯人民的人格陶冶有所貢獻。基於這種理念，蘇聯傳播媒體的運作、訓練及研究自有其一套理論依據。這個理論脫離不了馬克斯、列寧思想的範疇，其主要內容為：

1. 爲了維持工人階級的權力，所有的媒體都應當受工人階級機關的控制；傳播媒體不應該爲私人所擁有。

2. 傳播媒體應動用它的教育、報導、勸導、動員等正面功能爲社會服務，以達成社會與

經濟目標。

3. 傳播媒體應根據馬列主義原則，提供一套完整而客觀的社會觀與世界觀。
4. 對於反社會出版物，社會有權運用檢查制度與其他的法律形式予以防堵或懲罰。
5. 傳播媒體在社會的整體運作中，應該回應讀者、聽眾或觀眾的意願及需要。
6. 對國內、外所提倡的進步或改革運動，傳播媒體應予以支持。

儘管蘇聯憲法明文保障其人民知的權利，如憲法第五十條「為符合人民利益，並為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保證蘇聯人民享有言論、出版……之自由。實現此類政治自由之保證為：給勞動者及其組織提供公共建築物、街道及廣場，廣泛傳播消息，利用報刊、電視與無線電廣播之可能」，但這種自由卻不得損及社會與國家之利益。為了貫徹其傳播理念及保證人民的自由不踰越於限制之外，蘇聯當局對大眾傳播有一套嚴密的控制方法。

首先是對重要傳播媒體高階人員的指派制度。如真理報、消息報、共產黨人 (*Kommunist*)、國際生活 (*Mezhdunarodnaia zhizn'*) 等刊物的總編輯，均由蘇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以確保這些刊物的編輯路線符合黨及國家的要求。這些中央級主要報紙、雜誌的總編輯也常兼有蘇共中央委員身分，或以總編輯作為晉入中央委員會的跳板。地方性報紙的總編輯通常也是地方黨部的委員。總編輯們在考量其專業生涯及政治生涯前途下，無不忠誠地執行黨的指示。

其次是緊密的檢查制度。其實每一個作者心中都清楚那些內容不能寫，即使寫了也不能登。編輯部再進行第二層檢查，內容有問題的，都在這個階段解決。若有更大的疑義，則另請示黨工人員。

在檢查單位方面，屬於蘇維埃部長會議的新聞安全總署(Glavit: Main Administration for Safeguarding State Secrets in the Press)，則是全國性的單位，其人員遍及蘇聯各地，檢查範圍涵蓋報紙、廣播、電視與期刊。檢查人員常駐印刷廠、編輯室、電台播音間，所有材料在刊出或播出之前，均須其核可。它並與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合編一本檢查手冊，詳列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准媒體刊登的事項。在這本手冊中，隨時會加入新的限制材料。

從共黨的角度來看，報紙、電視、廣播和電影是思想戰線上的重要力量，因此它們的內容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及國家特色，而導致死氣沈沈、宣傳味太重、重複過多等。由於傳播媒體的主要任務在於說服與教育群眾，其次才是傳輸新聞資訊，時效性對蘇聯的報紙、電視、廣播而言，並不重要。通常蘇聯對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報導，常採取拖延的伎倆，以使一般大眾有足夠時間來接受這些消息。例如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烏干達阿敏政權的推翻，一九七八與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與蘇聯進兵阿富汗等新聞皆曾延後發表。

在讀者與觀眾方面，由於收聽外國廣播、閱讀地下刊物的機會增加，而對蘇聯官方一手控制的傳播媒體的教條式報導產生不滿。他們希望擁有正確、不同來源的資訊報導，並觀賞

較有趣的節目。這種趨勢迫使了當局採取因應措施，如對人民的意見尋求進一步了解，並在報導方式上稍加修改，增加人情趣味故事，娛樂特寫等，以吸引讀者與觀眾。不過，對蘇聯大眾傳播發生革命性改變，卻是在戈巴契夫接掌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

二、「公開性」對傳播媒體的衝激

(一)放鬆對傳播媒體的控制

戈巴契夫掌權後，改革運動為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帶來新風貌。同樣地，蘇聯的大眾傳播也有驚人轉變。

對戈巴契夫和他的同僚而言，「公開性」(Glasnost)是摧毀那些反對改造的官僚體系的工具；對蘇聯的新聞從業人員而言，「公開性」則代表了他們將有更多的報導自由。

蘇共廿七大(一九八六年二月)以後，蘇聯領導一再要求報刊以改革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要求報刊改變以往一味粉飾太平的作法，要真實、生動、尖銳地反映變革中的社會生活。在一九八六年，蘇聯「文學報」、「共青團真理報」先後刊登文章，揭露了存在於青少年中的嚴重吸毒問題，並呼籲有關部門迅速採取措施，以根治這一社會公害。「經濟報」、「社會主義工業報」(已在一九九〇年一月停刊)也先後以大的篇幅，介紹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在

經濟管理和科研組織方面的作法、及取得的經驗；此外，中共、匈牙利等實行經濟改革的作法及其經驗，也開始在蘇聯報紙上出現。

戈巴契夫初掌政權即對大眾傳播媒體採取開放態度是有其目的的：(1)打擊保守派，並剷除不勝任的官員。藉由傳播媒體揭發貪污、腐敗事件，及暴露社會不公平、經濟落後事實，戈巴契夫得以更替那些久在其位卻腐敗的官員。(2)利用輿論推動改革的進行。傳播媒體大量報導有關政、經改革事務，造成一股社會輿論，使戈巴契夫可以用以為推動改革的支持力量，並打擊保守派。(3)樹立個人開朗的形象，並藉以鞏固個人的權力。

「公開性」一字的動詞原意為「宣布」、「讓大眾知曉」，亦即過去隱諱的題材現在可以公開地討論。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出現了更多有關酗酒、嗑藥、交通事故、天然災害的報導。然在初期，報紙在處理敏感話題時，仍常引用學者來表達批判的意見，固然學者的話較有權威性，提出的意見也較能切中要害，然主要的理由亦在於編輯們可以因此而不用承擔政治風險。另外，大量刊登讀者投書，以表達一些特定的意見，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意見，以取代署名的社論，也是編輯們慣用的手法。從這個事實來看，早期的開放政策並沒有讓新聞從業人員大膽到為所欲為，當局無形的壓力仍然是他們頭上的緊箍咒。

(二) 通過「新聞法」與頒布「廣電法」

一九九〇年六月八日對蘇聯的大眾傳播從業人員而言，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

一天，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出版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的法律；當年八月一日正式生效。在這項含有七章、三十九條條文的法律，明文規定廢止行之有年的檢查制度，並保障新聞自由，任何機關、團體及年滿十八歲之蘇聯公民都有權利組織大眾傳播媒體；新聞媒體有權在不受干擾情形下，由國家機關負責人那裏獲得必要的信息等等。這項法律的通過，對傳播媒體意義重大。甚至官方的「消息報」都特別在頭版作出「再見了，檢查制度！」的醒目標題，以示慶祝。從此，除了主張以暴力推翻政府、煽動種族或宗教偏見，及鼓吹戰爭、暴力的言論不得刊登外，任何的消息和報導都可以出現在讀者眼前。而記者也擁有了出席會議、到災難現場採訪、訪問官員的廣泛權利。如果新聞內容在編輯過程中遭到竄改，記者可以拒絕在報導上具名。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四日，戈巴契夫以蘇聯總統身分簽署命令「關於蘇聯電視、廣播的民主化與發展」，進一步放鬆了共黨對國營媒體的控制。命令中著重指出，廣播和電視不應由某一政黨或團體壟斷；在蘇聯社會日益民主與多元化情形，國家廣播與電視的性質必須大幅調整。這項命令同時允許任何擁有足夠財力與技術的政黨或公共組織設立電台與電視台，不過需先經過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的批准。

(三) 新法律對傳播媒體的影響

新聞法的通過對蘇聯傳播媒體有重大影響，首先是使那些地下刊物(Samizdat)得以合法

化。根據蘇聯國家出版委員會(Goskompechat)副主席郭闊留克(A. Gorkovlyuk)的說辭，在一九九〇年八、九兩個月，總共有超過四百份的刊物向他的委員會及共和國政府登記，這些刊物中有許多是從前的非法出版品、及新成立的十三個政黨的刊物。

其次，一些主要的報紙雜誌因而重新登記為獨立性的出版品。原先只有蘇共、特定的社會團體（如職工會、作家協會等）得以出版刊物，在新聞法通過、可以以個人名義申請出版刊物後，一些編輯希望將編輯部人員登記為刊物的發行者，藉此也可以擺脫蘇共和那些屬於蘇共外圍組織團體的控制。迄今，蘇聯著名的「星火」雜誌(Ogonek)、「評論與事實」週刊(Argumenty i fakty)已重新登記為獨立性雜誌。另外，一群原為「莫斯科新聞」週刊(Moscow News)的工作人員也決定獨立出來，並創辦一個新的刊物「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

當然，新聞法並沒有解決有關新聞自由的所有問題。蘇共及政府官僚體系仍然拒絕完全放棄對傳播媒體的控制，也因此對渴望自由的新聞從業人員帶來牽制。由於新通過的法律並沒有對印刷設備的所有權作出特別規定，使得擁有百分之九十相關硬體的蘇聯共黨，及對紙張供應享有獨占權的蘇聯政府，仍保留了其對媒體享有的優勢。

而蘇聯在邁向市場經濟的同時，一九九一年的印刷費用將上漲百分之八十四，這對新成立的刊物將造成嚴重的財務危機。獨立性刊物的分送也是個問題。「蘇維埃出版局」(Soyuzpechat)拒絕接受對獨立刊物的訂單，使得這些刊物的發行者必須自己把刊物郵寄至訂閱者手中。

在獨立性報紙面對危機的時候，黨的報紙日子也不好過。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大眾傳播部部長波脫拉尼(M. Poltoranin)即指出，那些不改變他們保守路線的新聞從業人員是在玩火；「共青團真理報」總編輯弗羅尼(V. Fronin)也對即將有大批新聞人員失業一事提出警告。事實上，一九九一年的訂單大量減少不僅影響蘇共的出版品，對那些不肯改變作風的新聞人員亦構成嚴重威脅。這也是爲什麼「蘇維埃俄羅斯報」（曾是蘇共中央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部長會議的共同機關報）向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B. Yel'tsin)請求解除其總編輯齊金(V. Chikin)的職務，因爲後者想把該報變爲俄羅斯共產黨的機關報（不過，從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起，該報還是成爲俄羅斯共產黨的機關報）。而蘇共的機關報「真理報」也面臨裁員與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困境。

（四）蘇聯中央電視台面臨挑戰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要求獨立的同時，也對由中央電視台控制一切電視傳播事宜提出質疑。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早已宣布，電視乃是其主權範圍的事務，並已著手建立自己的電視公司。總統委員會委員雅可夫列夫(A. Yakovlev)曾對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在今日，中央電視台仍是戈巴契夫總統個人權力的最強有力支撐之一，因爲它仍保有全聯盟性的結構。由此可見，中央電視台的瓦解對蘇聯權力中心的影響有多麼大。

基本上，中央電視台是由蘇共中央委員會控制。新聞法的通過，並沒有改變它的性質。

而它面臨的最大挑戰，乃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主權獨立，包括將電視播出權歸於自己控制之下。其中，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有足夠的技術與政治潛力將這項宣布變為事實，對中央電視台的威脅也就特別嚴重。

戈巴契夫在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四日簽署的廣電法中，除了聲明電視應獨立於政黨與團體組織的影響之外，也同時強調了中央電視台的「國有」性質，而任何共和國或地區宣稱對它擁有法律、財產權均屬無效。不過這並不能改變俄羅斯共和國的決心。

——七月中旬，葉爾欽簽署法令，成立獨立的俄羅斯廣播公司。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可夫(N. Ryzhkov)立刻宣布，在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Gosteleradio)內成立一個俄羅斯聯邦編輯部以為回應。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在財力、人力占盡優勢，並可在俄羅斯組織好自己的公司前，就作出廣播。

——七月三十日，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再度重申它成立自己國有電視頻道、通訊社、出版局的決心。

——八月一日，戈巴契夫命令將「新聞社」(APN)改名為「新聞資訊社」(IAN: Informatsionnoe Agentstvo Novosti)，並將它改為國營的通訊社。

——八月三日，由蘇聯政府支持的「有線電視組織聯盟」(Union of Cable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宣布成立。這個組織的目的乃在於將五百多個區域性電視網統一起來，並將它歸於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城市蘇維埃的管理之下。

——八月三十一日，「全俄羅斯廣播與電視公司」(Vserossiiskaya Radiotelevision-naya Kompaniya, or VRTK) 宣布成立，除了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設立辦公室外，全俄羅斯的主要城市都將設立分公司。

看來蘇聯中央政府與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對於中央電視台控制權的爭奪仍將有一番惡鬥。

三、蘇聯的報紙、雜誌現況

在一九八九年內，蘇聯國內的報紙超過八千五百家，總發行量二億份；雜誌有五千二百餘種，總發行量三十七億份。無論是種類或發行量均十分龐大，報紙、雜誌發行量的排行榜請參考附表十一。

《表十一》蘇聯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主要報紙、雜誌發行量

(單位：百萬份)

報紙	Newspapers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九年
爭論與事實報	Argumenty i Fakty	一·四	一·九	三·二	九·一	二〇·五
勞動報	Trud	一六·七	一八·二	一八·二	一九·〇	一九·八

共青團真理報	Komsomolskaya Pravda	13.11	14.6	14.0	14.6	14.6
消息報	Izvestia	6.7	6.9	8.0	10.4	10.1
真理報	Pravda	10.5	10.8	11.1	10.7	9.7
農村生活報	Selskaya Zhizn	9.1	9.0	8.8	7.5	6.6
文學報	Literaturnaya Gazeta	3.0	3.0	3.1	3.8	6.3
蘇維埃運動報	Sovetsky Sport	4.6	4.6	4.8	5.2	4.7
蘇維埃俄羅斯報	Sovetskaya Rossiya	3.6	3.6	4.6	5.2	4.2
紅星報	Krasnaya Zvezda	11.11	11.3	11.3	11.0	1.4
社會主義工業報	Sotsialisticheskaya Industriya	1.3	1.3	1.3	1.5	1.0
經濟報 (1990年改爲·經濟與生活)	Ekonomicheskaya Gazeta (1990年改爲·Ekonomika i Zhizn)	0.7	0.7	0.8	0.7	0.7

雜誌	Magazines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農婦	Krestyanka	14.3	16.4	17.4	18.9	110.4
女工人	Rabotnitsa	15.9	17.3	17.5	19.8	110.4

健康	Zdorovye	一六·六	一五·九	一五·六	一六·八	一五·五
小說	Roman-Gazeta	二·〇	一·八	二·五	三·五	三·八
星火	Ogonyok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八	三·四
接班人	Smena	一·一	一·一	一·三	二·〇	二·四
政治教育	Politicheskoye Obrazovaniye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三	一·九
新世界	Novy Mir	〇·四	〇·四	〇·五	一·一	一·六
鼓動者	Agitator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四	一·二
民族間友誼	Druzhiba Narodov	〇·二	〇·二	〇·二	〇·八	一·一

當然這份排行在一九九〇年有稍許變動。如雜誌類的「星火」發行量已超過四百五十萬份。報紙類的「爭論與事實」發行量達三千三百萬份，仍穩居第一名；而「真理報」的發行量則降至六百四十萬份，在一九九一年還可能繼續下降。

蘇聯的報紙類型主要分兩種——地域性報紙與專業性報紙。地域性報紙又可分為全國性報紙，如「真理報」；加盟共和國報紙，如「蘇維埃俄羅斯報」；地方性報紙，由市、工廠、集體農場出版的報紙，規格不定，出版周期也可能不定，有些可能與手寫的大字報相去無幾。

專業性報紙則是針對特定專業團體或社會某個特定階層所出版的報紙，如軍方的「紅星報」，勞工的「勞動報」，青年的「共青團真理報」，蘇聯作家協會出版的「文學報」等皆是。

目前蘇聯報業的發展有幾個明顯的趨勢：

1. 革新。無論是黨報或獨立性報紙都必須以較活潑、生動的報導來吸引讀者，以在日趨競爭的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蘇共機關報「真理報」也在一九九〇年元旦起，去掉原登於刊頭的三顆勳章，以示改革。在西伯利亞發行的「共青站真理報」雖然第一版還保存了五枚官方頒發的勳章，但內容上早已報導了人民在除夕夜買不到酒而引起騷亂的「酒類革命」新聞。而蘇聯政府的「消息報」也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刊登西方的廣告。

2. 言論大膽。報紙除了不時刊登材料，揭露和批評各級幹部利用職權搞個人特權、貪污腐敗外，一些報紙更直接對蘇聯當局的威信提出挑釁。如「莫斯科新聞報」曾公開指責當時還在位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加契夫的立場為反民主，及欺瞞人民的行為。而以鼓吹拉脫維亞獨立為宗旨的「拉脫維亞人民陣線」機關報「覺醒報」更是百無禁忌，敢於深入官方媒體不敢碰觸的主題。

3. 新刊物大量出現。拜新聞法之賜，除了原為官方的報紙改登記為獨立性報紙外，新成立的刊物亦有如雨後春筍（特別是報紙）。莫斯科第一家民辦雜誌「俄國財富」已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得到出版許可。此一刊物主要以刊登文學作品為主，曾存在於一八七六一一九一八年間，這次可說是復刊。同樣地。十九世紀出版過的「祖國紀事」、「內外」雜誌也已復刊。

除了大量地下刊物重新登記為合法刊物，及私人創辦刊物外，蘇聯官方在近幾年也推出了幾種新刊物。如由蘇聯部長會議負責的「政府通報」（週刊）、蘇共中央委員會出版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公報」（月刊）均在一九八九年創刊。

在爭取獨立的同時，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也急欲擁有自己的傳播媒體，以宣揚自己的政治觀點。一九九〇年，它推出了「俄羅斯報」，同時問世的還有該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主辦的「俄羅斯週刊」；另外，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和最高蘇維埃研究院的週刊也問世了。

這些發展趨勢可說是戈巴契夫開放政策與通過新聞法的直接結果。目前蘇聯境內較具影響力的報紙、雜誌計有：

——「真理報」，為蘇聯共產黨機關報，一九〇五年五月五日創刊，這一天現為蘇聯出版節。在一片改革聲中，「真理報」也得改變它固有的、僵硬的編輯作風，以挽救逐年下降的讀者人數。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真理報」首次刊出一篇稱讚索忍尼辛小說「古拉格羣島」的文章，而點燃了有關這本作品的公開論戰。該報現任總編輯弗羅洛夫表示，「真理報」今後的編輯方針將是分析重於新聞報導，並在政治立場上採取中間路線。較之從前，「真理報」的確開放許多。立陶宛共黨可在該報專欄上表達要脫離蘇共而成獨立共黨的意見，即為明顯例子。

——「消息報」，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機關報，一九一七年三月創刊。特別著重有關最高蘇維埃、政府機關工作的報導。在改革聲中，「消息報」開始接受廣告的刊登，以增加收入。有關戈巴契夫的報導依舊是比較恭敬，不過也透露對戈氏的失望。

——「紅星報」，蘇聯國防部機關報，一九二四年元旦創刊。主要報導蘇聯軍方事務，立場保守。

——「共青團真理報」，蘇聯共青團機關報，一九二五年五月創刊。目前可說是較開放的報紙。曾刊登抨擊戈巴契夫的評論稿。

——「經濟報」，週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創刊。一九九〇年一月改名「經濟與生活報」。

——「文學報」，週報，原創立於一八三〇年，當時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也曾參與編輯工作；一九二九年復刊，為蘇聯作家協會的機關報。「文學報」雖以報導蘇聯文藝動態為主，近年來在批評蘇聯當局不當措施上亦著墨不少。

——「莫斯科新聞」，週報，一九三〇年創刊。現以俄文、愛沙尼亞文、英文、阿拉伯文、法文、德文、希臘文、義大利文與西班牙文發行。原先創刊宗旨是為外國讀者提供有關蘇聯生活的資料。近年來，它致力於報導改革事務、抨擊當局，言論大膽，造成一股令當局不能忽視的社會輿論力量。一九八〇年始發行俄文版，於一九九一年一月起才接受訂閱。

——「爭論與事實」，週刊，一九八〇年創立。創刊時係採取摘錄蘇聯和外國媒體報導的編輯方式，但自戈巴契夫上台後，其編輯方向已轉變。該報一律採取訂閱制，不零售，目前已有英文版在英國發行。這是一份民營報刊，目前每期發行量二千三百萬份，為蘇聯第一位。在它的報導中，不見文宣，沒有黨派之分，也不強調意識形態，而其內容的坦率、犀利常令

蘇聯當局難堪。

——「星火」，月刊，創刊於一九〇七年，原為蘇共宣傳機構的刊物，目前已重新登記為獨立雜誌。其言論尺度開放，報導內容尖銳、大膽，且不遺餘力揭發各種腐敗、阻撓改革開放的現象。

——「新世界」，月刊，創刊於一九二五年，為一文學性雜誌。該刊於一九八七年公然發表被禁的小說「齊瓦哥醫生」，而令人注目。事實上，該雜誌也曾發表過索忍尼辛的作品，及戲劇家布爾加科夫的原稿和信件，後者的若干作品是被禁止在蘇聯演出的。由此可見這份雜誌的前進立場。

四、其他的傳播媒體

(一) 通訊社

目前蘇聯境內有四家通訊社，除了歷史悠久、官方經營的「塔斯社」，社會團體經營的「新聞社」外，近年又成立了兩家民營通訊社——「內部傳真」與「普斯特發克譚」。

1. 塔斯社 (TASS: Telegraph Agency of the Soviet Union)

成立於一九二五年，為蘇聯的官方通訊社。其工作目標是：擴大共黨和蘇聯國內外政策

的宣傳，並且將有關共黨國家在經濟、政治和精神層面的生活，告知全蘇聯人民與全世界。

塔斯社向以報導蘇聯官方沈悶的八股言論為職責，但在政治情況鉅變、新聞開禁後，它也作了修改。目前雖然不至於公開批評當局，但從前被視為忌諱的天災人禍，如今也都披露如常，甚至提供民族反政府的示威遊行照片。

2. 新聞社 (Novosti Press Agency)

一九六一年成立，成立宗旨為：為外國的傳播媒體準備有關蘇聯國內外事務的編纂及圖片資料；提供外國政治、經濟、科學及文化的發展情形給蘇聯的傳播媒體；印製雜誌、報紙、小冊子，使外國讀者認識蘇聯。

新聞社是由蘇聯一些社會團體所經營（包括蘇聯作家協會，蘇聯新聞人員協會，蘇聯對外友誼、文化關係協會，全蘇職工會等）。它是由這些團體所資助，並以出版、販售文字、圖片資料給傳播媒體為收入。蘇聯政府對它不負任何財政、行政責任。「新聞社」例行出版品有以九種文字印行的「莫斯科新聞」週刊，及「史潑特尼克」(Sputnik)月刊（蘇聯式的「讀者文摘」），及五種文字印行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際」月刊。

一九九〇年八月，戈巴契夫下令更改「新聞社」名稱，並將它改名為「新聞資訊社」(Interfax)，成為國營通訊社。這項更名與改制的主要用意是：防止此一通訊社落入由葉爾欽所領導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控制。後者正在尋求控制某一通訊社，以便宣傳其觀點。

3. 內部傳真社 (Interfax)

「內部傳真社」雖宣稱自己是獨立的通訊社，但它實際上是由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創立，作為與一家蘇聯—法國—義大利合營電腦公司的合資企業，由前者提供它的記者、通訊處據點，後者則提供資金。「內部傳真社」也是「莫斯科電台」的對外新聞服務中心，原先的服務對象是外國駐莫斯科記者，每日以俄文、英文、西班牙文傳真重要新聞的評論，提供蘇聯重要時事的主題報導，及對傑出政治家、公眾人物的獨家訪問稿。

「內部傳真社」的真實報導風格已為它贏得愈來愈多的客戶，並成為「塔斯社」的強有力競爭者。

4. 「普斯特發克譚」(Postfaktum)

該通訊社為一商業取向的通訊社，由合作社協會及一些商業組織所資助，贊助者尚包括蘇聯共青團。它的記者與通訊網主要是以「商業週刊」(Kommersant)為其基本班底。

(二) 電視

蘇聯電視系統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它設有十四個加盟共和國分部，一百廿四個地區電視中心，計僱用八萬七千餘人。它每年預算廿七億盧布，由國家直接撥付。

蘇聯中央電視台負責所有電視播出事宜，它的中堅是奧斯塔基諾電視中心(Ostankino television Center)，負責一萬四千多個電視節目的製作，其技術人員分為十三個主編輯部。

中央電視台有四個主要行政部門：對外關係(the Administration for External Ties)，主管

所有對外合約和控制必要的外匯儲存。對外通訊(the Network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dministration), 管理蘇聯駐外的電視工作小組。節目部(Programming Administration), 負責分配各編輯部的製作。技術中心(Technical Center), 控制由全蘇傳播網的傳進訊號。這四個行政部門的主管同時也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的副主席。

蘇聯的電視事業已有五十多年歷史, 首次公開播放電視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九日。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起, 中央電視台正式開播彩色電視節目; 一九七八年起, 其播出的各套節目全部改為彩色。目前蘇聯以四十五種語言製作電視節目, 每日播放總時數達四千小時。中央電視台擁有十三個頻道, 每日平均總播放時數達一百五十小時。

蘇聯電視為國有企業(但各加盟共和國已著手爭取其獨立的電視節目製作、播放權), 在一片改革聲中, 它的播放尺度也逐步開放, 開始出現反偶像崇拜的內容, 反省檢討整個社會的轉化過程。為了進一步吸引觀眾的收視, 它的報導已由「告知」方式轉向「討論問題」的方式, 並大量製作圓桌座談、辯論與觀眾來電的節目。

就中央電視台的頻道而言, 其第一頻道為全國性新聞報導、社會政治、文化教育、文藝和體育節目。第二頻道為全國性文化教育、文藝和體育節目, 白天以教學節目為主。第三頻道為莫斯科的新聞報導及文藝節目。第四頻道是教學節目, 莫斯科市、莫斯科省及基輔可以收看。

蘇聯共劃分五個電視區, 其中有四個電視區包括兩個時區, 一個電視區包括三個時區(蘇

聯計分爲十一個時區)。

(三) 廣播

蘇聯當局視廣播爲通訊、報導、宣傳與鼓動的重要工具，因此極爲重視。廣播事務直接由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領導。除了設立全蘇中央廣播電台外，各共和國、邊區、省、城市、區都設有廣播電台。目前蘇聯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有線廣播系統，線路總長達二百萬公里。

全蘇中央廣播電台共有十個頻道，平均每日播出一百八十小時（一九八三年資料）。第一頻道，亦是主頻道，負責製播全國性的新聞、社會政治、文藝和文化教育節目，每日平均播出廿小時，向五個時區播放。第二頻道（燈塔廣播電台）日夜廣播，主要是新聞與音樂節目，向全國播放。第三頻道是社會教育、文學和音樂節目，平均播出十七小時。第四頻道是音樂節目，以中、短波播出，平均播出九小時。第五頻道日夜播出，主要是針對在國外的蘇聯人製播節目（如海員、漁民、兩極地帶的勘察人員等），內容有新聞、社會政治、文藝節目。

從一九二九年起，蘇聯開始了正式的對外廣播。最初是以德語播出，其後又陸續增加了英語、法語、希伯來語、華語等。到一九七五年，蘇聯從十個地區——莫斯科及亞塞拜疆、白俄羅斯、亞美尼亞、拉脫羅亞、立陶宛、塔吉克、烏茲別克、烏克蘭、愛沙尼亞等加盟共和國的首府，組織強有力的編輯部和大功率電台，以八十九種語言向全球播出，每週累計播出二千零廿二小時。僅莫斯科廣播電台對外播出時間即達每日二百九十九小時。一九六四年

「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成立，參與對外廣播。「莫斯科廣播電台」則是蘇聯最大的對外廣播電台。

(四) 電影

從一九一九年八月廿七日列寧簽署電影國有化的法令後，蘇聯的電影事業走過了漫長道路。

目前蘇聯有四十九家電影製片廠，其中十九家生產劇情片，三十家生產記錄、新聞、科教和美術片。這些分散在各加盟共和國的電影製片廠每年生產近一百六十部劇情片，一百多部電視劇情片，近一百部美術片，一千五百多部新聞、記錄和科教片。蘇聯擁有電影院十五萬二千多家，另有七萬七千多家不售門票的電影放映場所（如在學校、企業等單位內）。電影觀眾每年達四十多億人次，每年出版的電影期刊雜誌達五十餘種。

蘇聯電影事業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國家電影委員會。該委員會設有製片局、發行放映局等機構，分別負責電影製片、發行、放映、洗印等部門的行政管理工作。國家電影委員會直接領導全蘇電影發行總公司、蘇聯電影進出口公司等企業性單位。

在全面改革的浪潮中，蘇聯電影也有了改革的進展。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廢除國家電影委員會的攬權；讓電影製片廠獨立自主；鼓勵競爭和自然淘汰；推行經濟核算制，並逐步實現自負盈虧；編劇、導演、演員以訂立合約的方式來拍片。

爲了鼓勵各製片廠拍攝品質上乘的電影，對發行電影所獲收入的分配作了調整。過去，由電影發行部門向製片廠購買新影片時，除了付出片子的成本外，另外二萬盧布的利潤，一次付清，此後影片放映的收入全歸發行部門，而與製片廠毫無關係。現行的新辦法則是：電影發行部門開始只付給製片廠相當於影片成本二十五%的費用，然後再把全部收入的二十%付給製片廠。這樣，一部受到觀眾歡迎的影片爲製片廠帶來的收入往往比一部平庸影片高出數倍。從而鼓勵了製片廠開拍品質良好的影片。

開放對電影界的另一個影響是從前被查禁的一些電影現在已可公開放映。包括描寫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數十萬俄國人貧窮與飢餓處境的電影，及揭露史達林暴行、貪污腐化的電影。